

·文学与艺术·

# 《左传》盟辞的文学性及时代性

张 银

(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70)

**【内容摘要】**先秦盟誓是中国古代文体中的一种应用性文体,而《左传》盟辞更是其集中体现者。透过这些盟辞我们会发现,《左传》盟辞的句式、用韵、修辞和结构是非常讲究的,具有很浓的文学性。《左传》盟辞反映出春秋时代的社会心理认识趋向“信任危机”,社会中最活跃的主体不是诸侯和士而是这两者之间的卿大夫。另外,春秋时代的妾的地位要高于后代的封建社会。

**【关键词】**春秋 左传 盟辞 盟誓 文学性 时代性

**中图分类号:** I207.62

**文献标识码:** A

**文章编号:** 1007-9106(2008)03-0100-02

“盟”与“誓”本是先秦文学中一个范畴的文体,为了做到小处着手大处着眼,本人辑出《左传》中所有的书面盟“词”。通过分析这15条盟辞及相关背景,笔者发现春秋时的盟辞具有很强的文学性及时代特征。

## 一、浓郁的文学性

一种套用西方理论的附会认为,中国文学的自觉时期是魏晋时期。其实,不同的文体在不同时代的自觉是不一样的。在先秦,诗歌已经是一种成熟的文体创作,诗影响着当时所有的文体,先秦时作为实用文体的盟辞也受到了《诗经》的影响。

研究《左传》的盟辞我们不能仅仅依靠书面出现的文字,因为就连这15条盟辞也大多是省略了的。“先秦文献对于盟誓的记载往往只记某事,所载盟誓之文往往省略。”<sup>[1](P108)</sup>在总共15条文本盟辞中有10条明显省略。如“盟曰:渝盟,无享国。”<sup>[2](P82)</sup>“曰:恤病,讨贰。”<sup>[2](P750)</sup>“曰:同讨不庭。”<sup>[2](P1027)</sup>因此,我们研究盟辞不能太拘泥于《左传》中的文本,而要抓住重要性的内容来分析。

首先,盟辞的句式非常有特点:以四言为主,句数为偶,两句为一层,四句为一节。如“既盟之后,信归于好”,“皆奖王室,无相害也。有渝此盟,明神极之。/俾隳其师,无克祚国,及尔玄孙,无有老幼。”<sup>[2](P466)</sup>“天祸卫国,君臣不协……,不有居者,谁守社稷,不有行者,谁杆牧圉/有渝此盟,以相及也。胡神先君,是纠是殛。”<sup>[2](P469)</sup>“我无尔诈,尔无我虔”,“无相加戎,好恶同之,伺恤灾危,备救凶患, /若有害焚,则晋伐之,在晋,楚亦如之, /交贻交来,道路无雍, 谋其不协,而讨不庭, /有渝比盟,明神极之, /俾隳其师,无克祚国。”<sup>[2](P856)</sup>虽然盟辞大多有省略,但引述者也用偶句而不用奇句,所以,这也是一种文学性的反映,用在实用文体中,值得注意。

其次,仔细推敲这些盟辞,笔者发现它们大都有押韵的痕迹,而且韵脚一般用在偶句上或在对等句上。“皆奖王室,无相害也,有渝比盟,明神极之。/俾隳其师,无克祚国,及尔玄孙,无有老幼。”在上古“害”属月部,“极”属职部,“国”也属职部,“幼”属幽部<sup>[3](P685, 672, 673)</sup>,职、月同属入声韵<sup>[4](P28)</sup>,可旁转;职、觉同入声韵<sup>[4](P28)</sup>,可旁转,而觉、幽同属一类韵<sup>[4](P28)</sup>,可对转,故职、幽可押韵,所以“害”、“极”、“国”、“幼”是押韵的。另外,“室”属质部,“师”属脂

部<sup>[3](P678, 677)</sup>,质、脂是一类韵<sup>[4](P28)</sup>,可对转,是押韵的;“盟”属阳部,“孙”属文部<sup>[3](P676, 679)</sup>,阳、文同属阳声韵,可旁转。所以“室”、“师”;“盟”、“孙”分别是押韵的。这样,不仅偶句押韵,而且单句分别对称地押韵,这绝不是巧合。再如“交贻交来,道路无雍, / 谋其不协, 而讨不庭。”在上古,东、耕同属阳声韵<sup>[4](P28)</sup>,可对转押韵。再如“毋蕴年,毋雍利,毋保奸,无留慝,救灾患,恤祸礼。”<sup>[2](P869)</sup>。“利”、“礼”在脂部,“奸”、“患”在元部<sup>[3](P677, 680)</sup>,“慝”在职部<sup>[3](P672)</sup>。而职、质可旁转,脂、质可对转韵,所以,利、慝、礼是押韵的。“年”属真部<sup>[3](P678)</sup>,真、元同属阳声韵,可旁转。所以,年、奸、患是押韵的。其它较短的盟辞也多押韵,此不赘述。这些押韵的情况至少能说明,先秦应用文也同样受到了传统诗歌的影响。

再次,看这些盟辞的修辞,同样不像一般应用文。“我无尔诈,尔无我虔。”、“同恤灾危,备救凶患。”、“毋蕴年,毋雍利,毋保奸,无留慝,救灾患,恤祸乱。”这是十分工整的对仗。另外,值得我们注意的是,最后一则还有排渗透其中。再如“不有居者,谁守社稷?不有行者,谁杆牧圉?”这不但用了设问修辞,也是工整的对仗。一句而用两种修辞,这样娴熟不留痕迹,仿佛不是先秦古人而为。关于不守盟约的后果,作者更是用了极力的夸张,如“俾隳其师,无克祚国,及尔玄孙,无有老幼。”

另外,这些盟辞的章法结构、层次条理是十分清楚的。“综合《左传》记载与侯马盟书等实例,不难看出先秦盟誓大致是由三部分组成:(一)盟誓缘起,即叙述各方之所以盟誓的原因;(二)遵誓要求,即列出盟誓各方所应遵守的具体条款;(三)违盟恶果,即参盟各方共同约定。”<sup>[1](P109)</sup>《左传》僖公二十八年盟曰:“天祸卫国,君臣不协,以及此忧也,今天诱其衷。使皆降心以相从也。不有居者,谁守社稷?不有行者,谁杆牧圉?不协之故,用昭乞盟,于尔大神,以诱天衷。自今日以往,既盟之后,行者无保其力,居者无惧其罪。有渝比盟,以相及也,明神先君,是纠是殛。”这首盟辞相对完整,从开始到“以相从也”交代卫侯出奔又复位的原因。从“不有居者”到“以诱天衷”是对居住在卫都的人和跟随卫侯出奔的人都给个安慰,这些属于第一部分。从“自今日以往”到“居者无惧其罪”是交代卫侯复国双方遵守的誓约内容,属于第二部分。从“有渝此盟”至结束是

不守盟誓的后果,这是第三部分。《左传》15首盟辞中有5首提到第三部分内容,只有一首提到第一部分的原因。然而,只要是相对较长的盟辞,其层次、条理是十分的清楚。再如:“凡我同盟,毋遽年,毋雍利,毋保奸,无留慝,救灾患,恤祸乱,同好恶,奖王室……”这首盟辞中我们可以看出,先书重要的内容,再书次要的内容,而不是杂乱无章的。“年”在先,说明农业经济的重要性胜过其它。“患乱”在后而“奸”在其前,是因为春秋距西周不远,礼还有没丧尽,人们相对都能守礼,所以没有“奸”便不容易犹“乱”的原因。

从以上分析来看,《左传》中的盟辞并非没有文学价值,并不是史书的牙慧和屑末,而是值得我们充分重视的文学,从它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,除诗歌以外先秦其它文体中也存在浓郁的文学性。

## 二、鲜明的时代性

好的文学作品其价值远大于文字表面的内容。《诗经》、《楚辞》甚至《红楼梦》之所以成为显学,就是它们的价值决非仅仅表现在文字领域。同样《左传》中的盟辞给我们的东西也决非它的文学性,我们可以找到当时的社会性内容,熟悉那个时代,发现许多民族性的东西。

结合盟誓的背景和作用,我们会明白:到春秋时期,西周以前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完全信任已产生了危机。也就是说,这时已是人心不“古”。在阶级社会以前和阶级社会初期,忠信是人们的一种基本的心理认识,不需要过分强调它。“在昔三王,诅盟不及,时有要誓,结言而退。”<sup>[5](P117)</sup>“在浑浑沌沌的原始社会里,人们之间的信用不需要强调,它以天然的状态存在着,当人们感到需要强调信用之时,正是信任开始出现危机之日。”<sup>[1](P110)</sup>确实如此,综观《左传》盟誓(包括无盟誓文本内容的)近700次,244年间的历史竟这么多盟誓,这不正是人与人的不信任的充分证据吗?如果说法律制定是针对不守法而进行的,没有某种法律则没有那种违法的行为的话,那么,一次盟誓就是为了一次大的可能的不信任而进行的。翻开《左传》我们看到满目的盟誓,这就是因为在这个时代存在着普遍的人与人的不信任,也难怪老子提倡回到“小国寡民”的原始状态。在这一点上来看,除去生产力等外部因素,当时人们的思想并不比今天落后太多,只是由于生产力水平很低、文化和教育不太普及、传播渠道相对太单一以及几次大的“毁书”行为等综合原因,我们现在无法看到那个时代繁盛而斑斓的文化状况。

其次,从参盟者的主体来看,到春秋时期,活跃在社会上的群体已从奴隶社会的诸侯,下移到了卿、大夫这一级了。15则盟辞中,有8则是卿、大夫之间或以卿、大夫代表诸侯经进行的。再如鲁宣公十二年,晋原穀、宋华椒、卫孔达、曹人盟于清邱<sup>[2](P750)</sup>、鲁成公十二年,晋士燮会楚公子黑、许偃盟于宋西门外<sup>[2](P865)</sup>、鲁襄公十六年,六大夫(齐、晋、宋、卫、郑、小邾)盟于晋之温<sup>[2](P1027)</sup>。另外,其它没有标明卿、大夫的盟,还有可能多半是以卿大夫代表诸侯结成的盟。这些表明,在这一时期最活跃的社会人物不是王侯,也还没到战国时代的“士”这一阶层。这一信息说明,春秋时文化主流的下移,从诸侯下移到卿大夫这一级,为进一步下移到战国的“士”层做好了准备。这一过渡性意义重大,它为加速奴隶社会的瓦解,提供了思想文化方面的因素,补充了我们习惯于用生产力、生产工具来标识社会的进步与否。

再次,结合盟辞来分析每一首盟辞形成的历史背景时,我们会发现,盟辞实际体现了每个诸侯国的外交政策:以国家主体利益至上。鲁桓公元年,郑伯与鲁桓公盟于越:“渝盟,无享国。”此时背景是郑国强于鲁国,郑国拿靠近鲁国

的枋田来换取鲁国靠近郑国的许田(许田肥于枋田),这对郑国有利。鲁僖公九年,齐桓公与诸侯盟于葵丘:“凡我同盟之人,即盟之后,言归于好。”这是齐桓公霸业之事,参盟者有齐、鲁、宋、卫、郑、许、曹。在此之前,齐攻打这些诸侯之时怎么不来个“言归于好”?等到把人家打服了,怕人家的报复,为解除自己的后顾之忧,又想笼络人心,有利于进攻它国时,却来个“既盟之后,言归于好”?鲁成公二年,晋、楚在宋国的西门外盟是由宋国大夫华元撮合而成,此时楚晋都想争霸,宋夹在中缝,十分难受。虽然楚仍强,但是晋国已从邲之战中回复过来,已有晋厉公复霸的局面。“盖厉公之时,晋中央政权较巩固,师徒强盛,故能服三强、败楚师而致辞复霸之绩也。”<sup>[6](P70)</sup>所以,宋国为了在夹缝中游刃有余,不致于随晋则楚讨之而属楚则晋伐之的两难境地。宋国极力斡旋,终致晋楚之盟的“无相加戎,好恶同之,同恤灾危,备救凶患。”这与宋、晋、楚都有利。可以说,这些盟辞,对大国来说是显示强大,进一步联合小国为己服务;对小国来讲,则是利用大国之威力寻求庇护、免遭国难。他们(无论大小)都是在奉行国家主体利益至上的原则。从这一点上来说,春秋时代又是积淀着国家之间外交方面的丰厚储备,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。

另外,从盟辞的内容中还可以看出,在春秋时代各国对农业的重视,也是空前的。鲁成公十二年的“同恤灾危,备救凶患”、鲁襄公十一年的“毋遽年”、“救灾患”就是证据。尤其是后者,竟把“毋遽年”放在第一位。毋遽年,即不要藏着多余的粮食,不救济他国。可见,农业在国家中的重视程度之大。“救灾患”又说明旱、水灾对农业的影响会影响到国家的强盛。再如,鲁桓公元年的盟辞是为换田而进行的(郑以“枋”易“许”)。鲁国不会因为肥田失去而过分计较,间接地说明,农业的关键已不太受田地的肥瘠的局限。这也暗示出:个体耕种者在土地的使用上不太过于计较多少肥瘠,带有了准封建社会的特征。这便于我们更加充分地把握春秋的时代特征,有利于我们对春秋社会有一个较为丰满的认识,而非概念化、单一化,甚至是简单化的认识。

最后,《左传》盟辞中个别盟辞反映了春秋时代妇女的地位问题。昭公十一年,鲁国二女与孟僖子盟曰:“有子无相弃也。”这是孟僖子把二女立为妾后,二女与孟僖子(大夫)的盟辞。它反映当时大夫妾生子后有不封地(相弃)的可能,可见当时,妾的地位不同于封建社会的娶小。这则盟辞还反映,妾能与其夫平等对话(起盟),这与封建社会的妾的地位太低又不相同。同样有意思的是,鲁僖公九年,齐桓公称霸之时的葵丘之盟,《谷梁传》中却载有:“毋以妾为妻。”这从反面也说明,妾与妻有相同待遇之嫌,妇人有参与国事之嫌。这都反映此时的妇女,尤其是妾层女性社会地位,不是太低。这在文献很少的春秋时代意义重大,它对于我们寻觅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是很有价值的。

总之,如果把《左传》盟辞放在文学性之外的文化时代背景大圈中,我们仍然会发现它反映社会时代生活的立体感和丰厚感。我们应从中挖掘其深藏的各种意蕴和气息都会帮助我们更好地、充分地把握春秋乃至先秦时代的其它特征。

## 参考文献:

- [1]吴承学.先秦盟誓及其文化意蕴[J].文学评论,2001(1).
- [2]杨伯峻.春秋左传注[M].中华书局,2000.
- [3]王力.古代汉语[M].中华书局,1981.
- [4]唐作藩.汉语音韵学常识[M].上海教育出版社,1985.
- [5]郭晋稀.文心雕龙注译[M].甘肃人民出版社,1982.
- [6]童书业.春秋左传研究[M].上海人民出版社,1980.